

全球化學習會閱讀資料

2005/11/12 及 2005/11/19

選讀文章

壟斷資產階級由防禦轉為進攻的複辟行爲——新自由主義緣起考.....	2
國外左翼論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8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與全球化.....	12

原典選讀

《共產黨宣言》有關全球化的節錄.....	16
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	18

評論文章

論反對資本全球化.....	25
---------------	----

文甘君

【內容提要】新自由主義是一種階級現象，是壟斷資產階級爲解決同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矛盾，而採取的階級戰略或政策。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美國

在整個資本主義時代，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始終在爲開創解放和發展的道路一代一代地探索和艱難奮鬥。從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瓜分世界的爭奪，引發出兩次世界大戰。100年前的世界強國是美英法德意日。今天，世界強國仍然是這些國家。全球的最大利益，始終只在進入資本主義金字塔塔頂的國家之間進行分配。資本主義強國不允許，事實上也沒有再出現重複資本主義的老路並能夠趕上更不要說超過早期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大國。

數年前流行以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爲發展樣板，還有東德不如西德、朝鮮不如韓國、大陸不如“台灣”一類的說法。姑且不論這裏的“不如”之說到底有多少根據或者帶有政治偏見。第一，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發展的最輝煌時期，也算不上資本主義大國。第二，這裏當然有著自己人民的辛勤勞動，然而其發展卻帶有明顯的依附性，不能認爲是本國或本地區獨立發展的結果，而只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部分，或者毋甯說是櫥窗罷了。第三，特別是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台灣這些國家和地區，當美國需要它成爲包圍社會主義蘇聯和中國的前沿陣地的時候，不惜對它提供多種優惠和無償援助，而一旦失去這種需要，任憑一場金融危機的摧殘，就使它倒退二三十年，使那些業已取得的成就一夜之間煙消雲散。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歷史已經終結第三世界的發展前景。

1917年十月革命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主義作爲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確立下來。在帝國主義時代，蘇聯從第三世界崛起，在不長的時間裏，成爲足以同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並駕齊驅的世界強國。蘇聯抵禦和戰勝德國法西斯的進攻，極大地提高了社會主義的威望。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無論發展的速度和各方面的發展成就，同樣成爲奇蹟。社會主義開辟出一條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道路。它爲人類歷史進步提供的最主要經驗，在資本主義秩序的範圍之內，是不曾出現的：

- 這是以國家主權、民族獨立爲決定性前提和基礎的發展，而不是損害國家主權、民族獨立的發展。
- 這是主要依靠自己人民力量的發展，而不是主要依靠外來扶植和援助的、依附性的發展。
- 這是實現最大多數人權力和利益的、促進平等的發展，而不是削不足以增有餘、製造和擴大貧富兩極分化的發展。
- 這是同世界各國平等交往的發展，而不是損害別國利益或實行霸權主義的發展。

蘇聯、中國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自己的發展中都還存在多種缺陷、弊端和不完善的地方。一種新生的社會形態出現，它的人民爲其存在、發展、完善而奮爭；它的敵人自然會仇恨、扼殺、毀滅。以仿佛旁觀者的姿態，苛求其不得有任何缺陷、弊端和不完善，否則就嘲弄、譏笑，在它遭遇挫折的時候就趁火打劫，來一個牆倒衆人推，至少是不公正的和偽善的。

特別是蘇聯，從赫魯曉夫時代到戈爾巴喬夫時代，黨的領導集團逐漸改變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越來越遠地脫離自己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西方輿論，多年以來一直在談論資本主義美國的衰敗。其實蘇聯的衰敗和美國的衰敗，病竈都在資本主義而不在社會主義。

蘇聯和中國的成就，對於世界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成爲一種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力量。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100多個國家取得獨立，世界殖民體系遂告瓦解。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以社會主義爲目標，盡管理解不一、各國國情和發展程度不一，社會主義卻成爲一種帶有時尚特點的歷史選擇。20世紀70年代，一方面石油輸出國組織對本國石油資源實行國有化，第三世界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鬥爭進入新的階段；另一方面，肩負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期望和真誠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著名理論。同時則有美國侵略越南戰爭的徹底失敗。

馬克思曾經在一封寫給俄國19世紀革命家查蘇利奇的著名信件中提出，在某些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存在一種避免資本主義的弊端而“吸收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道路。正如兩位英國作者所說，在第三世界人民的視線裏，當時的蘇聯，就是“既能取得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成就和好處，又不發生資產階級所造成的剝削現象”的例證。（海

倫·德斯富瑟斯、雅克·萊維斯克：《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序言》，商務印書館 1983 年版。）一種新局面已經出現，在基本方面不同於資本主義的一種新的社會體系已經建立起來，這是人類進步事業和世界人民的幸事。

與此相呼應，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和人民解放運動取得長足進步。這種鬥爭迫使執政的資產階級政府採取某些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措施，導致二戰後福利政策的恢復和擴大。新自由主義的鼻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承認，當時英美知識分子中一大批人信奉社會主義。英國工黨把國有制寫入黨章，並在 1945 年 7 月的選舉中第一次獲得絕對多數。活躍在世界舞台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至今以參加 1964 年美國聲援黑人公民權運動的“向華盛頓進軍”大遊行而感到驕傲。美國一篇網站文章這樣描述那個時代的政治氣氛：如果你真誠地提出一些今天標準上的新自由主義的觀念或政策，你將會受到嘲笑或是被送入瘋人院。最少是在西方國家，在那時，每個人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或是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人。應該允許市場決定主要的社會政治事務，國家應該自動地縮小其在經濟中的作用，或是應該給公司以完全的自由，工會應該靠邊站，給公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的社會保護，這樣的觀念完全背離那個時代的精神。即使一些人實際上同意這些觀念，但他們在公共場合不願意堅持這一立場，並且很難找到一個聽眾。（蘇珊·喬治：《新自由主義簡史》，美國 z 雜誌網站 (<http://www.zmag.org/>)2001 年 11 月 4 日。）

接著發生被稱為“1968 年革命”的一係列事件：巴黎有“五月風暴”，學生以街壘路障同警察對峙，工人罷工並占領工廠；美國有反戰和民權運動的高漲，有“芝加哥騷亂”；德國出現紅軍；日本出現赤軍；拉丁美洲叢林遊擊隊槍聲四起，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的名字成為解放的象征。那是一種色彩斑斕的革命運動，吸引著廣泛的社會階層參與其中，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發出對現存資本主義秩序不滿和抗議的聲音。幾位美國學者的共同研究，得出一種耐人尋味的判斷：只有兩次世界革命。一次發生於 1848 年。第二次發生在 1968 年。兩次革命都是歷史性的失敗。兩次革命都改變了世界。1968 年革命是一場反對以美國組織其霸權為代表的 1945 年反革命的革命。它也是試圖實現俄國革命的最初目標，同時極力克服這場革命的局限。因此它也是一種揚棄，對 1917 年的揚棄。向前看，在這種意義上，1848 年革命是巴黎公社和俄國革命、巴庫大會和萬隆的大預演。1968 年是什麼事件的預演呢？（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等：《自由主義的終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6、347 頁。）

這場革命，給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帶來極大的震撼。

20 世紀的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成為人類進步的標志。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那是“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在西方，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和人民鬥爭熱潮，統治當局被迫採取的某些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政策，使那時成為西方輿論至今懷念和津津樂道的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但是對於壟斷資產階級來說，那卻是正在襲來的滅頂之災。一個簡單的賬單是：美國最富的 1% 人口的家庭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份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 16% 下降到 8%。一個把一己私利視同宇宙的臍眼、為了 400% 的利潤不惜上斷頭台的階級，怎麼可能心安氣順地接受如此殘酷的現實！

社會形態的更疊總是伴隨著反復出現的戰爭和死亡、破壞和倒退，陳舊的社會勢力從來都不會放棄任何一次反撲和奪回自己天堂的機會。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陳舊過時的社會力量雖然存在的基礎已經腐朽，卻一定會繼續苟延殘喘，“在咽氣之前還要作最後的掙紮，由防禦轉為進攻，不但不避開鬥爭，反而挑起鬥爭，並且企圖從那種不但令人懷疑而且早已被歷史所譴責的前提中作出最極端的結論來”。（馬克思：《反教會運動。——海德公園的示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II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63 頁。）

一種新的社會形態，以最終消滅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的理論旗幟和實踐，召喚著世界人民共同前進，在世界越來越廣大的土地上，以巨大的生命力和沖擊力使資本主義退縮和遁逃。在白宮和五角大樓，可以目睹驚慌、恐懼、悲觀的情緒。難怪杜勒斯、凱南等人物那樣急於進行和平演變的設計和操作，難怪肯尼迪驚呼共產主義的紅色風暴已經接近美國的西海岸，難怪以老成練達著稱的美國政治家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全集《白宮歲月》中，也這樣描繪他進入美國權力上層的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國際形勢：這是“國內分裂和國際動蕩的時期。在這段時期中，美國進入這樣一個世界，在這裏我們不再處於支配地位，但仍然擁有巨大的影響”（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第 I 冊“前言”，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 頁。）。

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稍微進行一點歷史的比較，事情就朗若白晝。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的總格局中分量有限，仍然處於落後狀態，然而中國修起了成片的高樓大廈和蛛網一般的高速公路，大量出口的紡織品一類產品尤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道獨特風景線。僅僅這些，就那麼強烈地刺激了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神經，使他們深感不安。他們費盡心機一次再次地妖魔化中國，制造“中國威脅論”。如一家台灣刊物所說，“中國的成功就是美國的威脅”，妖魔化中國和“中國威脅論”正在美國“排山倒海般展開”（《全球進入新結構性的高油價時代》，台灣《新新聞》2005 年 7 月 6 日。）。於是大喊大叫，軍事包圍，經濟遏制，文化滲透，沒完沒了地和中國過不去。

這既不是一個道德修養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理論創新的問題，而是一種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的規律。以對於世界歷史運動的深刻觀察和敏銳的政治警覺首先系統地揭示這一規律的，正是十月革命的領導者列甯。列甯在十月革命初期一再強調的那些論點，如果今天俄羅斯或烏克蘭的普通工人再來讀一讀，大約不會感到是危言聳聽了：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著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嘗試。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願意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鬥，為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為他們的家庭而鬥爭，他們的家庭從前過著那麼甜蜜的生活，現在卻被“平凡的賤民”弄得破產和貧困(或者只好從事“平凡的”勞動……)。(列甯：《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頁。)

在這種復辟的希望變為復辟行動的時候，鬥爭總是帶有空前的殘酷性和野蠻性。

壟斷資產階級急切地需要一種戰略的、政策的武器，以重新整合自己的隊伍，發起反撲，從防禦轉為進攻。蓄勢待發的新自由主義，恰恰適合著這種階級要求。

二

新自由主義喜歡把自己一套東西標榜為人類自然的、正常的、“別無選擇”的狀況。事實恰好相反，新自由主義之登上世界舞台和扮演主角，並不簡單地是學者鼓噪、媒體傳揚的結果，而是一種非常明確的階級的、政治的甚至政府有組織行為的產物。它是壟斷資產階級的選擇和人為的製造物。這個階級把巨大的榮譽給予它，投入巨額資金扶植它。他們相信“思想總會結出碩果”——這曾經是一位新自由主義者的一本書的書名。新自由主義被有意製造出來、推廣開去，目的就是由此顛覆社會主義、重新奴役第三世界和強化壓迫本國工人階級，取得資本擴張、利潤最大化的絕對自由，實現美國的世界霸權。從事情的結果來看，他們沒有白白地花費力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新自由主義只是一個名聲不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派別。壟斷資產階級大享為它不斷地鞏固陣地、擴大影響慷慨解囊。1974年和1976年，它的兩位領軍人物哈耶克和弗裏德曼，分別獲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曾任阿姆斯特丹跨國研究所所長喬治·蘇尚1996年撰寫的《單一思想是怎樣形成的?》(喬治·蘇尚：《單一思想是怎樣形成的?》，載法國《外交世界報》1996年8月號。)，提供了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大財團、大資本家贊助下勃然興起的若幹細節。

壟斷資產階級為新自由主義的研究、傳播和傳授提供著最優越的條件。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庫”不斷得到加強。其中被認為屬於“冷戰鬥士”的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20世紀60年代以後的年度預算為1700萬美元，“美國企業研究所”為1280萬美元，“傳統基金會”達到2500萬美元。此外得到巨額資助的，還有專門研究私有化的“卡托研究所”、專門批判收入再分配的“曼哈頓政治研究所”。1990年到1994年間，4家最大的新自由主義刊物《國家利益》、《公眾利益》、《新標準》、《美國旁觀者》等，從多種渠道收到2700萬美元的資助。作為對比，4家美國全國性進步刊物《民族》、《革新者》、《當代》、《瓊斯媽媽》，同一時期只得到26.9萬美元的“慈善贊助”。

出面提供資金的包括福特基金會、布雷德利基金會。靠美國大工業財團(如庫爾斯財團(啤酒業)、斯凱夫或美隆財團(鋼鐵業)、特別是奧林財團(化學工業))建立起來的基金會，也成為重要角色。奧林基金會的一本小冊子承認，他們的這種做法，就是為著“加強私有企業賴以作為基礎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機構”。這個基金會1988年為此捐助5500萬美元，取得任命大學領導人的權利。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等一些著名大學，都有奧林財團任命的法學、經濟學院的院長。

1988年，芝加哥大學請來一位名不見經傳也說不上有什麼學術成果的美國國務院官員。他受命發表演講，主題是西方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冷戰中大獲全勝，歷史由此到達終點。講演稿即刻在《國家利益》發表。這家刊物的社長歐文·克裏斯托爾自己動筆，還約請另一位出名的右翼知識分子塞繆爾·亨廷頓，在同期刊物撰文進行評論和推薦。接著是《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等報刊的轉載和評論。這個官員就是弗朗西斯·福山。他那個演講就是《歷史的終結》。由於更多財團的捐助和政府的推行，這本書很快以多種語言出版，被製造為世界名著，進入大學課堂，轉瞬之間占領全球。用《單一思想是怎樣形成的?》中的話來說，正是這種力量，“把電波和熒光屏占領下來，把意識形態的鐵環扣住了”。

需要一個補充說明：芝加哥大學和《國家利益》都是奧林財團的資助對象。《國家利益》得到的捐助為100萬美元。它的那位社長在擔任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的時候，還曾得到奧林32.6萬美元的資助。

1973年的石油危機引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低增長和高通脹。此前被邊緣化的新自由主義斷言，危機的深層次根源，

在於工人運動造成了“寄生性福利開支”的擴大和企業利潤下降。這種斷言本身，就具有投靠的性質。1979年撒切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第二年裏根出任美國總統。新自由主義從此成爲西方的政府行爲，並隨後通過強制和誘導的手段在全球推行開來。

三

新自由主義有種種別名，如裏根經濟學、撒切爾主義、芝加哥學派、供應學派經濟學、貨幣主義、新古典經濟學、公共選擇學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市場原教旨主義，在解體蘇聯和演變東歐的時候被稱爲休克療法，在拉美被稱爲華盛頓共識，在亞洲和非洲被稱爲結構調整。

壟斷資產階級向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發起的新自由主義進攻，從一開始就籠罩著一層厚重的非意識形態化的煙霧。

1960年美國出版一本總結美蘇冷戰的著作《意識形態的終結》，並在1961年、1988年、2000年相繼再版。這本書宣傳意識形態的鬥爭乃至意識形態本身已經衰微和毫無意義，世界的惟一歸宿就是資本主義。這種論調在美國司空見慣，如作者丹尼爾·貝爾所說，本書因其書名而非因其內容得以傳播。這個書名成爲一種判斷，得到新自由主義的特別賞識。

新自由主義最初的面目不過是一種經濟政策，在西方國家以克服凱恩斯主義無法解決的低增長、高通脹問題爲名，在第三世界國家以幫助擺脫經濟發展困境爲名。但是，它的經濟舉措的核心是私有化，亦即所謂“產權改革”。這實際上是針對勞動者和普通人民的一種財產權力的再分配，目的和結果都是使它更加集中於壟斷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搬出“小政府”、“減少政府幹預”和“市場自由”、“貿易自由”一類東西，摧毀第三世界捍衛自己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然而西方首先是美國的國家力量卻在無限地加強。資產階級國家作爲“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衝突”的表象喪失殆盡，正在日益同本階級合爲一體。

在英國，撒切爾主要的作爲是減少富人稅收、取消對金融流動的控制、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提高失業率和壓制罷工。在美國，策劃貨幣政策大轉彎、以高失業率爲代價平息通貨膨脹的沃爾克得到政治支持，被新上台的裏根任命爲美聯儲主席。裏根接著鎮壓空運管理人員工會的罷工，發出向工人福利、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發動全面進攻的信號。同時正如英國學者佩裏·安德森所說：“裏根及其政府部門優先考慮的是與蘇聯的軍備競賽。這涉及到一個應能破壞蘇聯經濟以及通過這種迂回方式顛覆蘇聯現行社會制度的戰略。”（佩裏·安德森：《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和教訓——一種獨特道路的確立》，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1年第3期。）

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僅僅20世紀80年代，就使美國上層10%的家庭的收入和原來相比增長16%，再上層的5%增長23%，最上層的1%增長50%。至於其他占人口80%的美國人，地位越低，失去的也越多。

在被解體的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和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奪回失去的天堂的努力、熱情、仇恨，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逝去變爲現實的力量。在人民革命中受到懲罰、流亡國外或被迫從事平凡勞動的皇親國舅、王公大臣、地主、資本家，紛紛回來索討過去的權力和財產：皇宮、城堡、住宅、工廠、商店、莊園、土地等等。一些國家還出現此類人物的政黨。被民族解放運動趕走的過去的宗主國，也以“投資者”的身份卷土重來。現在的被剝奪者，是由於革命而改變命運的普通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革命給予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社會權力煙消雲散。相當一批前共產黨員則轉向圖生存和發展，或者失業、被邊緣化甚至幹脆投入監獄。

新自由主義吹噓自己的公正客觀，以所謂非意識形態化瓦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嚴整性，閹割它的革命靈魂，同時卻制造和散布大量含混其詞、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的語彙取而代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不平等”、“階級”、“剝削”、“壓迫”、“統治”這些本來具有確切而實在內涵的概念，被認爲過時陳舊而束之高閣。現在成爲口頭禪和時髦標志的，是諸如“接軌”、“轉型”、“競爭”、“雙贏”、“靈活性”、“機會均等”、“現代性”、“新經濟”之類的東西。然後是被偽裝爲“國際社會”、“國際慣例”的西方首先是美國的輿論、需要、做法。一旦造出這類話語，就開動他們控制和收買的媒體地毯式轟炸一般日復一日地輪番鼓噪，淹沒一切不同的聲音，強制人們的思想在不經意間變爲他們話語霸權的奴隸。

新自由主義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在俄羅斯表現得特別露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葉利欽的改革贏得西方支持。他們把美國奉爲圭臬，認定西方推薦的休克療法是唯一可用的方案。西方的各種顧問團源源不斷湧入俄羅斯，“蓋達爾周圍的年輕改革家們狼吞虎咽地吸收著他們的建言。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全俄國的追星族們忙不疊地放棄共產信仰。有時，這些改宗者甚至比他們的意識形態新偶像還要正統。”（奧列格·鮑戈莫洛夫：《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俄

羅斯》，載《國際社會科學》(中文版)2001年2月。)

一位意大利記者觀察俄羅斯社會歷史倒退的過程，突出地看出作為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的作用：應該說，我們大家都生活在“意識形態”的強大磁場上，在這個磁場上，規則是由“盎格魯撒克遜”經濟制定的……但是我們大家，不管我們願意還是不願意，都是在“美國”模式的框架中思維的。形成社會輿論的大眾媒體所推廣的，就是這一模式的思想。請看這不就是意識形態嗎？按照這一意識形態，這個模式就成了對無數群眾來說是“惟一可能的”模式，而群眾的輿論則是由人數不多的一批美國模式的崇拜者和手中掌握大眾媒體的祭司和助祭們來定的。共產主義不是已經死了嗎？好極了，必須用“美國”模式來填補這個空缺。就因為它是“惟一的”模式。(朱利葉托·基耶薩：《別了，俄羅斯！》，新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6—57 頁。)

新自由主義不是靠理論的、思想的力量，而是靠金錢、權力、欺騙技巧直到導彈和航空母艦推行開來和取得主導地位的。如果說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思想的貧乏使它的進攻不得不經常地表現為偷換概念、逆轉語彙的鬧劇，或者如法國《外交世界》所說，制造一些“全球新俗套”的話(《全球新俗套》，載法國《外交世界》月報總第 554 期。)，那麼恰恰在俄羅斯這個馬克思主義一度成為統治思想的國家裏，新自由主義改革家發動了討伐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的戰役。鑒於剩餘價值學說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這成為一種帶有根本意義的、志在釜底抽薪的戰役。

他們宣傳，不是勞動創造價值，而是資本、管理、思想創造價值，體力勞動的生產活動如同蜜蜂一樣僅僅是為了滿足自身生存的需要，以此證明雇傭工人通過交換得到的報酬符合他們作為“會勞動的畜生”的社會地位。但是難道思想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不是同樣地受到資本的剝削嗎？難道資本可以不通過對於雇傭勞動的剝削而自我增殖嗎？俄羅斯一家雜誌回擊這種胡言亂語時指出，“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企圖把勞動(連同其他因素)說成只是價值的部分來源或者說只是價值的一半來源，同時，他們又把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交換描繪成等價交換，企圖用等價交換這塊遮羞布把資本的剝削實質掩蓋起來。”(《“理想”資本主義的秘密被揭露了嗎？》，載俄羅斯《工會》2001 年第 2 期。)

四

這裏有什麼非意識形態嗎？沒有。這是貨真價實的意識形態，甚至他們的“非意識形態”本身也屬於意識形態。

對於任何重大的社會歷史現象，都不能不提出為什麼人、對誰有利的問題。意識形態不過是一定思想、觀念、精神的出發點和歸宿，問題仍然歸結為為什麼人和對誰有利。比如，沒有為藝術的藝術，沒有為哲學的哲學，也沒有離開特定社會關係的經濟增長。當新自由主義把經濟增長宣傳為社會活動的主軸的時候，他們所說的其實是從屬於資本主義關係的利潤增長即資本家利潤的最大化。施工修建一座大廈，大廈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誰得到利益、誰付出代價。大廈不僅是鋼筋水泥的堆積物，而且這些鋼筋水泥和所有的建築材料，大廈施工的每一個環節和程序，它的投入使用和維護，都灌注著特定的社會關係。

美國本來是一個意識形態傾向極為強烈的或者說以意識形態為本的國家。它向自己國民灌輸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美利堅人是上帝派來拯救世界的。當這種濃厚的宗教信仰和民族優越感被納入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時候，它就成為直到今天美國官方還在強調的他們的“軟力量”。這種“軟力量”正在被用於征服世界和實現美國霸權。它同時成為這樣一個“全球洗腦”的過程。這就是以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扼殺和取代世界各民族人民的豐富多彩的文化創造，剝奪他們的歷史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使他們永久地、心甘情願地成為《共產黨宣言》所說的那種“發財致富的條件”。這就是全球美國化。

人們已經從不同的方面揭露新自由主義之作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性質。前引法國《外交世界》稱之為文化帝國主義的“符號強暴”和“對人們思想的殖民主義征服”。美國學者詹姆斯·佩特拉斯談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理論的時候說，儘管它志在剿滅非資本主義形態，在理論上、學術上價值不大，但它“為一個根本的政治目的服務”，被用來在意識形態上“論證不斷擴大的社會不平等，擴大的社會兩極分化，以及國家資源日益被轉移給資本都是正確的”。他把推行新自由主義直接稱為“通過特定機制”進行的“收入和財產的反革命”。(詹姆斯·佩特拉斯：《全球化：一個批判性的分析》，《批判的範式：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5、279 頁。)兩位德國作者的著名的《全球化陷阱》，幹脆把新自由主義叫做“華盛頓和倫敦的掌權的市場激進派把供求規律美化為可能有的最好的指導原則”的“國家意識形態”(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0 頁。)

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執政當局先後程度不同地轉向新自由主義。在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新自由主義的推行正在和已經造就一種以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填滿私欲的買辦性、依附性資產階級勢力。美國以其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壓力和文化的誘騙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連美國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也把推行新自由主義

作為自己的當然使命。

這就像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所說的：

考慮到堆積如山的錢財和美元的強大力量，誰會奇怪全球資本主義勢力操縱了“華盛頓共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全世界所有最富有而強大的國家？誰會奇怪全球資本主義勢力控制了目前正在被宣傳推廣並實施著的全球化進程？難道我們會奇怪為什麼全球化總是為那些非常富裕者而不是那些非常貧窮的人們貢獻力量？難道我們會奇怪為什麼他們沒有絲毫熱情和犧牲精神為整個人類社會的共同發展而努力？（馬哈蒂爾：《全球化與共同發展》，2001年10月20日在上海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高峰會議上的演講。）

一位美國學者說得好：新自由主義是“蓄意實現人口中最富裕階層的階級權力復辟的工程”。

應該說，在這種階級權力的復辟工程中，還包括著民族權力的復辟。後一種復辟，主要用來回應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以期收回、削弱或者取消第三世界國家爭得的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權力。

回應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社會主義、民族解放運動對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嚴重威脅，在全球刮起階級復仇、民族復仇的旋風，“恢復被奪去的天堂”。這種階級的、民族的復仇導致的全球白色恐怖，是全方位的、大規模的。與此同時出現的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確立美國的世界霸權。——這已經為凱恩斯主義所無法承擔。

但是研究新自由主義緣起和它何以在一個時期稱雄全球這樣的問題，僅僅討論它同凱恩斯主義的關係，就很難作出全面的判斷。問題的症結在於，無論凱恩斯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或者是布什政權新近奉行的新帝國主義，都是一種階級現象，都是壟斷資產階級為解決同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矛盾，而采取的階級戰略或政策。

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5 年第 5 期

國外左翼論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周穗明

「全球化」是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世界流行話語。國外左翼思想家就全球化的背景、起源、矛盾、前景和歷史走向等問題，全面闡述了當代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未來社會主義的關係。

一、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西方左翼一般是從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歷史進程、現代性的關係出發，來解讀全球化的起源和動力。英國學者赫爾德認為，當代全球相互聯系並不是一個嶄新的現象，全球化廣義上可溯源到人類在地球上出現的時候，而狹義上是指 16 世紀以來的事情。全球化重點是指狹義的歷史分期。這一分析表明，全球化是 1500 年以後、即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產物。資本主義是一種全球現象。資本主義借現代化創造了世界近現代史，締造了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當代全球化是這一歷史進程的新階段的產物。它標志著全球相互聯系的空前強化和深化。

當代全球化的技術動力是信息產業革命：當代全球化產生的背景，是冷戰結束所引發的世界經濟結構變革和市場擴張。在對當代全球化動力的認識上，西方自由主義右翼和馬克思主義左翼都是全球主義者，公認當代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的必然階段。區別僅在於，新自由主義強調全球化的主要動力是信息技術變革或資本主義市場擴張；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全球化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新自由主義者歡呼個人自主和市場原則戰勝了國家權力，認為全球化是經濟邏輯的必然結果，因而把單一全球市場的出現以及全球競爭規則贊美為人類進步的標志，並稱全球化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先兆。比如，新自由主義者大前研一認為，當代全球化標志著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裡，各個民族日益服從於全球市場的約束。一些新馬克思主義者如法國學者弗朗索瓦·沙奈、美國學者保爾·庫格曼等人認為，全球化本身是一個歷史的、自然的發展過程，是生產社會化的繼續和深入，這個過程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轉的。當代全球化的發展結果是建立了金融資本占統治地位的世界積累制度。吉登斯、貝克等社會民主主義者確信，在新千年到來之際，全球化已成為推動社會政治以及經濟快速變革的中心力量，將重新塑造當代世界。儘管他們強調全球化過程內部的多樣性，認為全球化不是單一的技術變革和市場擴張過程，而是包括技術變革、市場力量、意識形態以及政治決策在內的多因素過程。但是，他們都深信全球化是一個以西方主導的、不可抗拒的自然過程。

西方左右派在全球化內容的述說上並無太大的差別，只是對其性質和方向有不同的認知。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必然派主張線性進步論，贊揚信息技術和自由市場的單向發展推進了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進程；而西方左翼的全球化必然派則堅持一種辯證的進步論，既承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客觀必然性和歷史進步意義，也批判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經濟社會文化弊端，揭示其資本主義性質和導向，更重視多向的、復雜的全球化。

另一類西方左翼從後現代主義的立場否定全球化必然論，從整體上質疑全球化。他們認為，全球化必然論的所有左右觀點都難免把全球理解為西方現代性在全球的擴張。事實上，全球化是西方現代性的勝利，導致了資本主義性質的現代化的實現。赫斯特和湯普森認為，現在的歷史事實並沒有表明全球化的出現，充其量只是出現了高水平的國際化。現有的經濟整合水平沒有超過 19 世紀末。全球化是一個神話，其程度被完全誇大了。美國著名的新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弗裡德里克·傑姆遜說，現代性不是一個概念。它是意識形態、生活方式，是現實，而現實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敘事。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是現代性的代名詞。德國左翼烏爾裡希·貝克認為，認識到全球化挑戰的人必須作出抉擇：必須重新思考西方現代性的基礎。

二、全球化與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西方左翼學者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當代資本主義的種種新變化，如信息革命條件下產業結構的變化、國際分工體系的變化、勞動就業結構的變化、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等等。最近，他們強調全球化的核心是資本在當代的新變化。

在 2001 年第三屆巴黎國際馬克思大會上，法國學者讓-克羅特·德羅奈認為，80 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最深刻的變化發生在金融領域。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之後，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信息革命為資本主義提供了技術和生產力基礎，而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則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形成的必要條件。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經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所有制關係並沒有改變，但是資本的增殖形式卻發生了變化，資本的價值形式演變成貨幣資本和金融資本的二元結構。由於金融資本的發展，直接金融(finance direct)取代了中介金融(finance intermediee)成為資本價值的最主要形式。由於金融及其衍生產品的發展，金融資本在時間和空間上，對資本使用價值的生產實現了全面的、不間斷的、有效的控制，從而實現了資本的增殖，即資本利潤的最大化。

法國學者皮埃爾·勒·馬森則從金融自由化的角度說明金融資本的新變化。他認為，在二戰後「凱恩斯主義共識」

下的「有管理的金融體系」削弱了金融資本對經濟的控制，曾經造成了戰後經濟的迅猛發展。自 1974 年起，過度積累問題公開化。英美政府的支持促進了金融資本的擴張。在新的金融體系中，各種金融市場取消了壁壘，全球資本自由流動成爲法則，使金融資本實現了對流動性不大的工業資本的統治。保羅·斯威齊在談到這些變化時，稱之爲「金融資本的勝利」。

美國學者理查德·奈德勒和法國學者弗朗賽特·拉扎爾等人從資本社會化、如股權分散化的角度分析當代金融資本新變化的原因。80 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出現了股權分散化的趨勢，股民數量多、人數增長快、持股量上升。其原因在於，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條件下，資本社會化迅速發展，需要吸收工人的儲蓄，作爲投資加入金融資本的積累過程。同時，資本市場的發展，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特別是養老金、互助金等集體投資機構的湧現爲個人和家庭進行投資創造了便利條件。他們看到，資本社會化與資本自由化是互補的現象。80 年代以來，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關係最大的變化是國有部門私有化以及股權分散化的進一步發展。在私有化浪潮中，大量私營企業的融資活動和股權分散化等共同推動了當代金融資本的發展。法國學者米歇爾·阿格利埃塔指出，股權分散化與金融資本的積聚和集中是同時進行的。雇傭勞動者的家庭金融資產不能脫離金融壟斷資本而獨立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雇傭勞動者對資本的間接從屬由於工人持股而更加深了。新的經濟關係中所體現的資本社會化趨勢，如股權分散化和資本所有權和管理權兩權分離等現象，表明資本主義的管理形式發生了變化，但是並沒有發生資本權力的真正轉移。

德羅奈主張歷史地辯證地看待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和發展。他認爲，當代金融資本具有雙重性質。它不是經典意義上的「食利資本」。當代金融資本並非置身於生產變革過程之外，它是發展信息和服務業的載體，甚至金融產品本身就是特殊的信息產品。金融資本特別是風險資本的發展爲促進新技術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壟斷資本具有進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金融壟斷資本又建立了金融專制統治，成爲加強和擴大國內國際剝削的工具。今天，金融已發展成相對獨立的領域，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分離的現象日趨嚴重。金融投機造成了金融和經濟的不穩定並頻頻引發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壟斷資本對經濟發展又具有破壞作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不是簡單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作爲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又包含了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

三、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霸權

一般的全球化理論認定信息生產力和市場擴張是自然趨勢，左翼的全球化理論則揭露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對當代全球化的塑造作用。許多西方左翼學者指出，全球化不僅是一種客觀趨勢，也是一種主觀作爲。80 年代以來的一系列新自由主義舉措，成爲推動當代全球化的政策槓桿。20 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已在西方取得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和霸權，確立了它在經濟強勢、政治強權基礎上的文化價值霸主地位。

對全球化持懷疑論觀點的左翼學者並不是一般地否認全球化的客觀動因，而是反對全球化必然論所宣揚的宿命論歷史觀，努力揭示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英國學者大衛·哈維明確指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當代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幫助資本打破資本積累中的一切空間障礙的努力。西方左翼學者普遍認爲，新一輪全球化浪潮是伴隨著市場自由化而到來的，資本把市場自由化的邏輯推向全世界，圖謀打破民族國家及其一切壁壘，建立資本暢通無阻的全球市場。德國《明鏡》雜誌的兩位記者馬丁和舒曼指出，在新自由主義信條的指引下，西方大部分實行經濟自由主義政策的政府在 80 年代展開了一種爲資本爭自由的鬥爭。它們在廣闊的戰線上廢除了各種控制措施並堵塞了國家干預的可能性，還通過貿易制裁或其他高壓手段強迫那些並非情願的伙伴國家也採取同樣的方針。實行非調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這三「化」就成了西歐各國和美國經濟政策的戰略工具，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義綱領推崇爲國家意識形態。美國學者麥克切斯尼認爲，全球化這一概念通常被用於描述某種無情的自然力量，容易使人誤解，更好的用語是新自由主義，這一概念所指的一系列政策有利於商業在受到最小阻力的情況下，在所有社會事務中占統治地位。法國學術泰斗皮埃爾·布迪厄指出，新自由主義已成爲當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強勢」話語。這種話語在一個由各種強力關係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強力者一邊。這一新自由主義烏托邦是由那些銀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以及那些從中獲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證明的高級政府官員、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共同營造的。

在「911」事件僅半個月後召開的第三屆巴黎國際馬克思大會上，德羅奈明確指出，國際範圍的公共干預對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關鍵性作用。法國學者米歇爾·阿格利埃塔認爲，當代資本主義的調節方式自 80 年代以來發生了轉變，其政策主流從以凱恩斯擴大財政預算、增加消費需求的理論爲基礎，轉向以增加供給、擴大投資的理論爲基礎。因此，從福特主義增長方式向金融資產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國家宏觀調控的結果。國家層面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到處要求開放市場，打破壁壘，解除管制，成爲當代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的政策工具，同時也造成了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全球擴散。

布迪厄在具體地描述受損害的法國工人階級的現狀時指出，瀰漫歐洲、拉美以及其他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所造

成的暴力如此強大，純粹的概念分析已經徒勞。新自由主義是一場保守的革命，這一打著「進步」旗號的復辟在當今社會有強大的力量。

在對全球化中新自由主義霸權的批判過程中，西方左翼思想家前期集中批判了「歷史終結論」（福山所宣揚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已取得最後勝利的理論）。「911」以後，當前西方左翼已將批判重點聚焦到兩種論證新自由主義霸權合法性的最「新」理論，即所謂「失敗國家論」和「新帝國主義論」上來。

四、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發展

國外左翼學者在傳統上是從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質出發，論證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的。新千年以來，由於「911」和歐洲極右翼思潮泛濫兩大事端，他們開始反思全球化引發的兩種極端主義（即西方以排外主義為特征的極端民族主義和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極端民族主義），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和資本主義與外部世界（即南北之間）這三大矛盾的發展和激化。

首先，全球化的發展激化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西方左翼人士紛紛指出，由於70年代末以來的全球資本自由化運動，全球資本主義明顯占據上風，出現了強資本弱勞動的力量格局。開放市場的資本自由化使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尋求最廉價的勞動力市場和投資地，造成發達國家的資本外逃，導致工作崗位大量流失；高新技術革命進一步導致了發達國家的結構性失業，深化了持續多年的勞動危機。德國社民黨政治家赫爾穆特·施密特指出，全球化、世界範圍的自由化使得這些跨國康采恩可以在本國大量地、完全合法地避稅。法國學者皮卡第·托馬斯指出，反全球化的群眾抗議是由於全球化中的不平等引發的。全球化在發達國家引起了社會不平等的擴大，使工人階級內部競爭加劇，工作和生活條件惡化，失業率上升，社會福利減少，再分配制度遭到破壞。金融家索羅斯說，市場的過度擴張可能會摧毀西方的民主制度，造成更大的貧富分化。1998年以來世界範圍內爆發的大規模的反全球化運動，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民眾的抗議運動。運動的目標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反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泛濫和金融壟斷集團的統治。「911」以後，反全球化運動再掀高潮。2002年11月10日，百萬西方反全球化人士再度聚集意大利佛羅倫薩，舉行反戰反全球化的大規模示威。澳大利亞民主社會主義黨認為：反全球化的實質是反資本主義。他們提出的口號是：「人民重於利潤」。許多學者指出，勞動危機帶來的社會痛苦是當前歐美社情趨於右傾的主要根源，也是「第三條道路」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另一些左翼人士就安然、世通等信用丑聞深入剖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病變。美國的威廉·法普夫指出，當代全球化中採取美國商業模式的國家，「管理者資本主義」取代了「業主資本主義」。公司管理人員利用公司所有權分散的漏洞，使公司變成了為自己謀利的工具。這是資本主義自身的腐敗，也是這個社會自身機能的腐敗。英國的尼爾·弗格森認為，過去10年泡沫經濟使財富發生了令人吃驚的轉移，從股民階層轉移到經理階層。現在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出了問題。美國的資本主義危機與其說是經濟的，倒不如說是社會的，與其說是物質上的，倒不如說是道德上的。

其次，全球化的發展加劇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為了在全球化中奪取更大的利益份額，發達國家之間展開了國家經濟競爭力的爭鬥。近年來，美歐、美日等西方大國之間齟齬頻生，摩擦不斷。歐洲左翼的批判集中在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問題上，他們批判新自由主義「市場至上」和「全球治理」的偽善性及其造成的惡果，反對「民族國家消亡論」。赫爾德認為，當代全球化是個激烈對抗的過程，並不像極端全球主義者所說的必然縮小國家主動性的範圍。全球化的當代模式已產生重大的制度影響，單個國家無法操控全球生態安全、金融安全等問題。但是，全球化正在重組或者「重新調整」國家權力、功能以及權威。瑪麗·克勞德·斯莫茨譴責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全球治理」很可能不過是一件理想主義、舉世歸心的外衣，下面隱藏著最狡詐的經濟自由主義。

最後，全球化的發展使南北矛盾尖銳化。西方左翼認為，資本主義的生存從來都離不開高度整合的外部空間，全球化的過程就是資本對外擴張的過程。在西方占絕對優勢的全球化和國際秩序中，所謂削弱國家職能，就是削弱第三世界國家干預西方資本流動、保障本國主權和民族獨立的職能。美國左翼阿蘭·伯努瓦認為，「國際組織本身已成為全球化的工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作用就是強制實行解除管制、管理貨幣的波動、強迫第三世界經濟服從於償還國債的絕對命令」。墨西哥《至上報》1998年3月14日的文章《不平等的北南貿易》認為，市場的過度擴張也會影響發展中國家，拉大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法國學者貝爾納·熱比埃指出，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利用國際組織機構推行全球化，損害不發達國家的主權和公民權。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全球化已傷害了許多人成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那些窮人。全球化扭曲了資源分配，以犧牲公共產品為代價來支持私人產品。全球性金融市場易發生危機。對於那些關注全球社會公正的人來說，與全球化相聯的不平等性一直就很明顯。

「911」後，各國學者指出，全球化中出現的巨大的南北不平等是產生恐怖主義的重要基礎之一。烏克蘭的「E.H.哈爾拉緬科和A.B.哈爾拉緬科提出，能否認為「911」事件是絕望的人們對於將人類劃分為被剝削的大多數和一小撮

宗主國的帝國主義「新世界秩序」的報復?在 2001 年 12 月初慶祝諾貝爾獎設立 100 周年聚會上，在世的諾獎獲得者發布的一項悲觀的聲明指出：貧窮和不公正感已在世界上造成了帶有殺機的憤恨，仇恨的大火會把窮人和富人一起吞噬。

五、全球化的未來走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在全球化未來走向的問題上，新自由主義的極端全球主義者認為，在全球化的新時代，各個民族日益服從於全球市場的約束，堅信資本主義全球化必勝。馬克思主義者和另一些左派則呼吁構造公民社會的社會主義全球化，為人類爭取美好的未來。

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不贊同那種對全球化抱有的普遍樂觀主義態度。他說，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從來沒有任何合理性。即使自由資本主義市場比其他體制產生更高的增長率，它也不可能產生最佳的財富分配。21 世紀的財富由越來越少的人創造。我們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不是增加生產，真正的困難在於如何才能夠分配這些財富。我們所知道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通過國家與公共權力機構進行財富的重新分配。哈貝馬斯說，對於戰後歐洲出現的政治與社會制度來說，經濟全球化構成了一種挑戰。出路可能就在於，重新培育調控市場的政治力量。「911」以後，沃勒斯坦指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500 年來第一次處在體系危機中，處在過渡時期的世界左翼應適時提出改變世界的新綱領和新策略。西方左翼和社會主義者通常是從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論證資本主義全球化沒有出路，並由此反證社會主義全球化的必然性。目前的新視角是，要從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制度邏輯矛盾的高度把握資本主義新變化，充分說明全球化的社會主義走向的必然性。否則，將落入當代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窠臼。

法國歷史學家比埃爾·維拉爾等指出，今天，資本和人類又一同跨入了新的千年，資本在當今人類社會占支配地位，人類遠未從資本的陰影下走出來，但是資本主義並不是最理想、最合理和最後的生產方式。美國《每月評論》編輯部評論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意味著停滯趨勢和金融危機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所有地方都面臨著大量閒置的生產能力和堆積如山的債務。在這種制度結構中，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這場危機的結果可能開啓爭取替代社會的鬥爭。可以肯定兩點：一個由人民統治並以滿足人民需要為目的的新社會的到來必然要經過激烈的鬥爭；人類未來所面臨的不可能是一個平等的、可持續的資本主義。法國學者托尼·安德列阿尼指出，社會主義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在資本主義各種矛盾演進的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必須在探索中前進。社會主義一時出現的歷史倒退和不確定性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沒有出路，相反，在這種倒退中又形成了新的社會主義模式如市場社會主義等等。社會主義具有無限的發展能力，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深入人心。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都是不可避免的。

法國第十大學教授、馬克思研究中心主任雅克·比岱分析了現代社會中的階級和政黨問題，提出了在當代爭取社會主義全球化的前景。他指出，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並不是完全在財產權即市場的基礎上進行自身再生產的。像市場一樣，組織是所有霸權計劃的承擔者，其存在和運行的條件延伸到所有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領域有組織管理的方方面面。基於「組織」和「市場」這兩種階級因素之上的現代化社會中的兩大政黨已不是傳統的左右翼，而是政壇上的兩種戰略立場。它們許下不同的諾言，但說的都是統治階級的語言。政治棋盤上還存在第三種可能的立場，即替代的方式。這種替代型政黨只有通過所有受剝削的大眾的聯合才能產生。帝國主義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得不根據普遍合法性制度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這就為人類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機會。因而，當今的社會主義解放運動變成了反對金融和軍事帝國主義的市場要求的鬥爭，即轉向了促進世界民主制度的發展和全球公眾的討論和對話。具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傳統的各種社會文化力量推動了反全球化的鬥爭，即一場實際上是爭取另一種全球化的世界範圍內的社會運動。他認為，這種階級鬥爭的結構為現今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新的背景，其前景對中國具有重要意義。他相信，曾經為我們共同的歷史做出過很多貢獻的中國人民今天代表著我們(社會主義)共同未來的偉大希望。

馬克思雖沒有提出全球化概念，但有世界歷史概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爲了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空洞抽象的人，馬克思提出了「現實的個人」概念。爲了說清「現實的個人」，馬克思提出了世界歷史概念並著意加以界說。在馬克思看來，世界歷史理論包括：1·世界歷史理論的哲學基礎是實踐論，客觀基礎是生產力和交往發展的特定社會歷史水平；2·世界歷史誕生的標志是世界市場的形成；3·歷史是否爲世界歷史的判定標準在於用什麼生產和如何生產；4·世界歷史分爲資本主義世界歷史和共產主義世界歷史，必然趨勢是從前者走向後者；5·世界歷史形成和發展的動力是生產力與交往方式之間的矛盾運動；6·世界歷史的分析單元是世界而非民族和國家；7·世界歷史的價值取向是無產階級；8·世界歷史概念是時間、空間、生產力和交往發展的特定水平、社會歷史性質、階級傾向性、線性歷史觀和普世價值論的有機統一。由此看來，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是自成系統的。以往人們往往忽略世界歷史理論與全球化的關係。如果把兩種理論加以比較，便會發現二者之間有諸多一致之處。

首先，二者都秉承線性歷史觀。不可否認，兩種線性歷史觀的具體內容有本質區別，但在思維方式上，二者之間的一致之處確實存在。

從文化淵源看，它們不像儒道兩家的回溯式歷史觀，主張「祖宗之法不能變」或「道法自然」，也不像佛教的輪回式歷史觀，而是都與基督教中的線性歷史觀——不同於現在的未來是末日審判，末日審判之後是千年王國——有著文化淵源上的密切關係。從外在表現形式看，二者都崇奉進步觀念，進步是好的、有益的，否則，便是壞的、有害的。與此相伴隨，一系列價值坐標出現在線性歷史觀中，進步是文明、先進、發展，相反者是野蠻、落後、停滯和衰退。從理論功能看，以進步爲核心的線性歷史觀是事實和價值有機統一的分析框架，任何國家和民族的存在樣態及其獨特價值，一旦被納入這種分析框架，都要改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受到線性歷史觀的框衡和責詢。結果是，它們的存在樣態及其獨特價值平等地存在權利被剝奪，呈現在人們眼前的是世界歷史或全球化的梯級演進結構，異於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國家、民族的存在樣態及其獨特價值，被賦於適應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及其衍生形態需要的特定地位、存在理由和相應價值。

其次，世界歷史理論和全球化理論把工業文明或工業文明的衍生形態——信息文明作爲自己的客觀基礎和比照標準。馬克思的名言「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爲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爲首的社會」可作證據。新一代全球化理論倡行者把價值傾向掩藏在商品、資本、勞務和信息全球化背後。

再次，世界歷史理論和全球化理論都注意到工業文明的無限擴張性，並努力論證工業文明及其衍生形態——信息文明的合理性和優越性。馬克思曾數次提到大工業的革命性問題，並認爲，大工業的存在基礎及本質是不斷超越和擴張自身，與此相反，其他文明形態是保守的。全球化理論的思想先驅之一——丹尼爾·貝爾把全球化的動力理解爲以工業文明的衍生形態——信息文明爲基礎的資本的集約化和技術的發展。熊彼特則以創新範疇爲核心，全面概括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無限擴張的本質生命：創新是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生命線，捨此，便會絕氣斃命。創新具體表現爲下列五種情況：1 產品創新，2 生產方法創新，3 市場創新，4 原材料創新，5 制度創新。熊彼特正是在這幾種名之爲創新的擴張中，發現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全球化的秘密所在。

最後，世界歷史理論和全球化理論都堅持普世價值觀。具體說，二者都堅持以工業文明及其衍生形態爲客觀基礎、以線性歷史觀爲思維框架和崇奉進步爲外在表現形式的普世價值觀。在世界歷史理論中，馬克思屢屢涉及到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與其他種類文明的撞擊問題。他認爲，歷史的存在和發展是一條不斷上升的線，處於線的上端者採取所能採取的手段把處於下端者拉入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發展的軌道合乎歷史發展規律，歷史就應當這樣發展。資本主義全球化第一次高潮中，當時的全球化理論中有「統治有色人種是白種人的責任」的驚世狂言。

第二次高潮中，有現代化理論及其「法定」標準作爲衡量不同國家、民族發展程度存在理由的價值標準。在第三次高潮中，理論口號更具誘惑力，這就是「人權高於主權」的命題。歷史表明，丟掉主權以後談人權，是癡人說夢。

世界歷史理論與全球化理論有本質區別同樣是不爭的事實。

第一，主體區別。在世界歷史理論中，主體是無產階級，這在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有透徹論述。全球化理論試圖造成假象，似乎全球化社會歷史運動只不過是商品、資本、技術、信息、體制和價值觀念的自由流動。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全球化的主體是資產階級，差別在於第一次全球化高潮中，資產階級粗蠻驕橫，以堅船利炮開路，這給人以海盜、土匪的印象。第二次全球化高潮中，資產階級挾起公文包，其中的內容是現代化理論，公開身份是政府顧問、經濟專家、銀行家或企業家。第三次全球化高潮中的資產階級是「未來震蕩」的主宰、「後工業社會」的祭司、「知識經

濟」的上帝，「經濟全球化」的牽線人。

第二，制度區別。馬克思把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看作世界歷史運動的必經階段，它發揮手段和工具的作用，完成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任務。世界歷史進展到共產主義階段，制度上與資本主義時代相比有本質區別，僅從經濟方面看，所有制是公有性質，資源配置方式是計劃經濟，分配制度是按需分配，這一切的前提是生產力高度發展和物質財富充分湧流。全球化三次高潮的制度實質是資本主義，在經濟方面，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憲法的第一信條，資源配置方式是市場經濟，分配制度是以按資本分配為主。

第三，價值取向區別。在世界歷史理論中，馬克思幾乎在每篇著作中都講到資本主義全球化帶給人民屈辱和災難，他關注和同情的是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的生存境況，追求的是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的解放。全球化理論中有一條思想線索不管被說得多麼巧妙和隱晦，也會暴露出內在本質：自私乃人之本性。

爲了取得私利，直取的效果遠不如以爲他人效勞的名義採取利己的行爲更有效率，更堂而皇之。全球化理論倡行者，都按此種方式思考問題，甚至按此種方式提出問題。從價值取向角度看，全球化理論的實質是爲資產階級及其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追逐私利辯護。

第四，邏輯線段區別。世界歷史理論和全球化理論都涉及到三種社會歷史時段：以工業文明爲客觀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此前的傳統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趨向。這是二者尊崇的線性歷史邏輯的主干。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是：在世界歷史理論中，資本主義並非是線性歷史邏輯的終結，而是新社會形態的準備和起點。這一邏輯的硬性要求是，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裡的滅亡和勝利不是同質社會歷史形態範圍內的外在表現形式變化，而是質變，一種社會歷史形態代替另一種社會歷史形態。與全球化理論相比，這裡的線性歷史邏輯多了一個時段，因爲全球化理論認爲，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的終極性發展階段，在這裡不會發生本質性變化，變化的只不過是外在表現形式或出現衍生成態。

反全球化運動的「全球化」 龐中英

反全球化的言論與作為當代主流意識形態的全球化針鋒相對，體現了後冷戰時代愈來愈清晰的意識形態分界線。反全球化越來越成爲一場世界運動

今年4月21日，加拿大魁北克第三屆美洲國家組織高峰會場外，大批反對組建全部美洲國家（除古巴外）自由貿易區的示威群眾情緒激昂，當局如臨大敵，警民嚴重對峙；6月15日，歐盟首腦會場外，兩萬多反歐盟、反美國和反全球化的歐洲人示威抗議，隨即發生騷亂，景色優美的瑞典西南海港哥德堡成了「戰場」。

從1999年西雅圖反世界貿易組織的大規模騷亂算起，兩年來，幾成習慣，反全球化示威往往針對全球性或區域性的重大國際會議，而且每一次幾乎都會不幸地演變成會議東道國與抗議者的嚴重暴力衝突。

更充滿悖論的現象是，當今的反全球化越來越成爲一場世界運動，反全球化運動本身已經「全球化」了。

來自全球各地的工會、環保活動者、性別平等主義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與極端主義者等，因爲反全球化而走到一起。他們當中年輕人居多。

不過，正如西雅圖世貿組織會議、魁北克美洲國家組織會議與哥德堡歐盟首腦會議遭遇的抗議所展示的：反全球化的中心與動力源在西方與其他發達地區，因爲那裡也是全球化的中心與動力源。

有意思的是，布殊這次首訪歐洲，在西歐（西班牙、比利時與瑞典）遭聞大批反全球化人士的抗議聲浪，但在東歐（波蘭、斯洛文尼亞）的情況卻沒有那麼糟。

發達的傳媒讓人們迅捷目擊街頭抗議，反全球化的各種觀點卻往往不爲人知。

民主主義、生態主義、女權主義、和平主義者等雖然都各有其反全球化的觀點，但它們也多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認爲現在的全球化嚴格意義上應叫「公司全球化」，這樣的全球化不是社會一體化的動力，而是社會解體的力量。公司主導的全球化使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不平等、不公正進一步加劇。

認爲地球環境將因爲市場全球化而受到最後的致命一擊。發達國家普遍把「 舊經濟」部門轉移到第三世界，推動了第三世界的工業化，結果全球工業化，人類環境不堪重負。

認爲全球化不過是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的偽善說辭，因爲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方面總是很保守。

全球化的擁護者相信全球化會帶來進步，比如富者會愈富，窮者也會變富，因此有助於許多世界問題的解決。反全球化者承認全球化能帶來一些諸如性別平等與強調普遍人權等方面的進步，但他們認爲，與全球化帶來的「災難」相比，這些「進步」簡直不值一提。

反全球化的言論與作為當代主流意識形態的全球化針鋒相對，體現了後冷戰時代愈來愈清晰的意識形態分界線。

反全球化的後面是對喪失的惶恐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去年4月發表了《千年報告》。該報告談及反全球化問題，他認爲：「很少有人、團體或政府反對全球化本身。他們反對的是全球化的懸殊差異。……更廣義地說，全球化對許多人意味著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無法預測的力量的傷害，這些力量有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經濟不穩和社會失調。 ……甚至在最強大的國家，人們不知道誰是主宰，爲自己的工作而擔憂，並擔心他們的呼聲會被全球化的聲浪淹沒。」

安南報告從一個最典型的角解解釋了反全球化現象。但全球化帶來的不僅是一個「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問題，批評者們提出了更尖銳問題——「誰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一個結果是「第三世界化」——發達國家出現了貧困化與邊緣化群體（雖然這種貧困與邊緣化不能與窮國類比），第三世界國家卻出現了大批可以在全球經濟中行動自由、富可敵國的新富。如美國與加拿大貧富兩極分化

日益明顯，而墨西哥則出現很多世界級的跨國公司與億萬富翁。

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為增加競爭力而向外轉移投資、原有「福利國家」制度在全球化沖擊下開始崩潰、合法與更多是非法的外來移民大量進入，於是當地居民把自己失業與收入下降的原因歸咎於全球化。

在第三世界國家，富者進入全球經濟體系，但窮人、弱勢群體與土著居民仍然度日艱難。在本國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經濟緊縮計劃下，那些不能面向出口的或者競爭力不強的大批中小企業蕭條甚至破產，金融危機又使得千萬人的收入大幅降低。

總之，無論富國還是窮國，雖然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機遇、潛力與可能，但全球化同時產生了人類必須面對的新挑戰與新威脅，對大多數人來說，教育、就業、收入、健康、文化、環境等人類切身利益，變得更加不確定與不安全。他們反對全球化的後面是對喪失的惶恐。

反全球化運動與觀點魚龍混雜，有些行為與觀點是顯然錯誤、過激、非法和非理性的。反全球化示威者攻擊國際組織，就是找錯了宣洩的對象。

但是，參與運動的多數人士也並非某些媒體所說的「無政府主義者」、「新法西斯主義者」與「極端主義者」。反全球化示威中，一些極端口號與行為不可避免，後果也相當糟糕，但它們不是主流。

反全球化運動的真正問題在於，他們的許多觀點雖然切中要害，卻不能提出建設性的方案。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兩大勢力還沒有交集，最近發生在北美與西歐的新事件表明，兩種力量的對立在升高。雙方都不可能接受彼此的邏輯，對立將繼續。因此，預料反全球化現象還要深入發展。更多值得思索的問題

當今世界經濟表面繁榮的背後確實隱藏著嚴重的問題與危機。全球化遭到越來越多的反對，說明全球化之下的市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正在嚴重脫節。如果我們希望看到全球化的可持續發展，並造福於大多數人，就必須糾正全球化的片面性。市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應該成為當前全球化進程中急需調整的方向。

反全球化運動中孕育著新的世界矛盾。當前的世界矛盾仍然是窮者與富者的對立，它通過各種諸如社會抗議、貿易爭端、民族（種族、族群）沖突、反美主義、反自由貿易、反地區集團化、文化沖撞等新的形式表現出來。

在全球化加速的情況下，未來世界的危險性確實來自公司（資本）的統治、技術的統治與少數集團、寡頭國家的統治，即人們正在討論的「全球民主赤字下的全球治理」。上述哥德堡示威「三反一體」的特點——反歐盟（在眾多歐洲人看來，歐盟只是歐洲政治精英的得力工具，缺少充分的民主基礎）、反美國（美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並且以自己的意志統治世界）與反全球化結合在一起——正反映了這一問題。

環境問題與全球化的關係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最近十幾年加速的全球環境惡化正好與加速的全球化一致，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現象。

民族國家認同問題在全球化進程中也變得空前突出，反全球化者不認同全球化主張者弱化民族國家的邏輯，因而兩者日益分屬於不同的集團。今天的世界現實是：不是工人無祖國，而是跨國公司與那些不願意打領帶的精英階層無祖國；那些無法在全球經濟中支配自己命運的人更需要新的民族認同與民族國家。多樣的民族認同與民族國家如何與單一的全球經濟共存是世界性的挑戰。

《共產黨宣言》有關全球化的節錄

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城市的城關市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

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以前那種封建的或行會的工業經營方式已經不能滿足隨著新市場的出現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場手工業代替了這種經營方式。行會師傅被工業的中間等級排擠掉了；各種行業組織之間的分工隨著各個作坊內部的分工的出現而消失了。

但是，市場總是在擴大，需求總是在增加。甚至工場手工業也不再能滿足需要了。於是，蒸汽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現代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工業中的百萬富翁，一支一支產業大軍的首領，現代資產者，代替了工業的中間等級。

大工業建立於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排擠到後面去。

由此可見，現代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的產物。

資產階級的這種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有相應的政治上的進展伴隨著。它在封建領主統治下是被壓迫的等級，在公社裡是武裝的和自治的團體，在一些地方組成獨立的城市共和國，在另一些地方組成君主國中的納稅的第三等級；後來，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是等級君主國或專制君主國中同貴族抗衡的勢力，而且是大君主國的主要基礎；最後，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它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裡奪得了獨佔的政治統治。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超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軍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關係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僱的僱傭勞動者。

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

資產階級揭示了，深受反動派稱許的中世紀的那種力的野蠻表現，是以極端怠惰作為相應補充的。它第一個證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甚麼樣的成就。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征討的遠徵。

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從而對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進行革命，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倆的相互關係。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關係。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太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砲。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象它使鄉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裡。由此必然產生的後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係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徵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太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裡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

馬克思

1848年1月9日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公眾大會上

先生們!

英國谷物法的廢除是自由貿易在 19 世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在廠主們談論自由貿易的所有國家裡，他們主要指的是谷物和一切原料的自由貿易。對外國谷物征收實行保護關稅，這是卑劣的行爲，這是利用人民的饑餓進行投機。

廉價的面包，高額的工資，這就是英國的自由貿易派不惜耗資百萬力求達到的唯一目的，他們的熱情已經感染了他們在大陸上的同伙。總之，人們要求自由貿易，是爲了改善勞動階級處境。

可是，奇怪得很!想盡辦法讓人民得到廉價的面包，而人民卻毫不領情。現在英國的廉價面包，如同法國的廉價政府一樣，都信譽掃地。人民把那些充滿獻身精神的人們，包令、布萊特一類人及其同伙，當做自己最大的敵人和最無恥的僞君子。

誰都知道：在英國，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間的鬥爭被稱爲自由貿易派和憲章派之間的鬥爭。

現在我們來看看英國的自由貿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證明促使他們起來行動的那種高尚情感的。

他們向工人這樣說：

谷物稅是工資稅，是你們向大地主，向這些中世紀的貴族交納的稅；你們陷于貧困，是因爲生活資料的價格昂貴。

工人反過來問廠主們：在最近 30 年中，我們的工業獲得巨大發展，而我們的工資的下降率卻大大超過了糧價的上漲率，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照你們所說的，我們交納給地主的稅，對每一個工人來說，每周約計 3 便士；可是，在 1815 年到 1843 年這一時期內，手工織工的工資從每周 28 先令降到 5 先令，而在 1823 年到 1843 年這一時期內，自動工廠織工的工資從每周 20 先令降到 8 先令。

在這整個時期內，我們交納給地主們的稅從未超過 3 便士。而在 1843 年，面包價廉，市場繁榮的時候，你們對我們說過什麼話呢？--- “你們是不幸的，因爲你們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們的婚姻比你們的手藝還要多產！”

這就是當時你們自己對我們說過的話，同時你們還制訂了新的濟貧法，設立了習藝所這種無產者的巴士底獄。

廠主對此回答說：

工人先生們，你們說的對，決定工資水平的不僅是谷物的價格，而且還有供給的人手之間的競爭。

但是請你們仔細地想一想：我們的土地都是由巖石和砂礫構成的。或許你們還以爲可以在花盆裡種植谷物呢!要是我們不是慷慨地獻出自己的資本和勞動，用來耕種不毛之地，而是撤掉農業，專門來搞工業，那麼，整個歐洲就得把工廠都關掉，那時英國也就成了唯一的大工廠城市，而歐洲的其他部分就都變成英國的農業區了。

可是廠主和自己的工人們的這番談話被一個小商人打斷了。他向廠主說：

如果我們廢除了谷物法，那麼我們就荒廢了農業，但是我們也不會因此而迫使其他國家關閉它們的工廠來購買我們的工廠的產品。

結果將怎樣呢？我將失去現在農村的主顧，而國內貿易也會喪失市場。

廠主拋開工人轉過身來回答小舖主說：這件事就聽之任之吧。一旦廢除了谷物稅，我們就會從國外得到更廉價的谷物。那時，我們就會降低工資，同時在那些供給我們谷物的國家裡，工資卻會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我們已有的那些優越條件之外，又加上更少的工資，有了這一切優勢，我們就能迫使大陸購買我們的產品。

可是，現在農場主和農業工人也插進來爭論了。

他們叫道：可是我們到底又將如何呢？

難道我們應該把養育我們的農業宣判死刑嗎？難道我們能夠聽任別人斷絕我們的生活來源嗎？

反谷物同盟卻不作回答，而一味滿足于給三部論述廢除谷物法對英國農業產生有益影響的優秀著作頒發獎金。

獲得這種獎金的是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三位先生，他們的著作已有成千上萬冊在農村流傳。

其中一位獲獎者企圖證明，自由輸入外國谷物既不會使農場主吃虧，也不會使雇傭勞動者吃虧，吃虧的是只是地主。他大聲疾呼：英國農場主不應該害怕谷物法的廢除，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像英國那樣生產如此價廉物美的谷物。

因此，即使谷物價格下跌，也不會使你們遭致損失，因為這種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縮減，但絕對不會傷及工業利潤和工資，它們依然會保持在過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獲獎者是莫爾斯先生。他相反地斷定，廢除谷物法的結果是谷物價格上漲。他挖空心思力圖證明，保護關稅從來都沒有能保證谷物得到有利的價格。

他引用事實來證實自己的論點說，在英國，每當輸入外國谷物的時候，谷物價格總要大大上漲，而當進口減少的時候，谷物價格便急劇下跌。這位獲獎者忘卻了不是進口引起價格上漲，而是價格上漲引起進口。

他的見解同他的獲獎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斷言說，每次谷物價格上漲總是有利于農場主和工人，而不利於地主。

第三位獲獎者是大廠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為大農場主寫的，他不能滿足于重復類似的濫調，他的話是比較科學的。

他承認谷物法之所以會引起地租的上漲，只是因為谷物法會引起谷物價格的上漲，而谷物法之所以會引起谷物價格的上漲，正是由于谷物法會迫使資本投于劣等地，這是很容易說明的。

隨著人口的增長，由于外國谷物不能輸入，就不得不去開墾肥力較差的土地，耕種這種土地需要較大的耗費，因而它的產品也就較貴。

既然谷物的銷路有充分保證，那麼谷物的價格必然要受耗費最大的土地的產品價格的調節。這一價格和優等地的生產費用間的差額便構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廢除谷物法而降低了谷物價格，從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話，那麼，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不再沒有收益的土地上耕作的緣故。由此可見，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農場主的破產。

為理解格雷格先生的話，作這幾點說明是必要的。

他說，那些不能再繼續經營農業的小農場主，可以去工業中謀生。至于那些大農場主，則必然在農業中取勝。或者是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他們，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和他們訂立期限極長的租約。這就有可能使這些農場主把巨額資本投向土地，更大規模地採用機器，從而也就節省了手工勞動，但手工勞動也將由于工資的普遍下降(這是廢除谷物法的直接結果)而更加低廉。

包令博士對所有這些論證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認。他在一個公眾集會上大聲說：“耶穌基督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耶穌基督！”

顯然，這種虛偽的說教根本不能使工人為面包跌價而感到欣喜。

其次，對於廠主那種單憑一時心血來潮而發的慈悲，工人又怎麼能夠相信呢？要知道對於將工廠工人的工作日

從 12 小時減到 10 小時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反對最力的，正是這些廠主們！

爲使你們對廠主的慈悲得到一個概念，先生們，我提醒你們注意一下所有工廠都採用的廠規。

任何廠主都有他自己使用的一套規程，其中規定對一切有意無意的過失都處以罰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語或談笑，遲到了幾分鐘，損壞了機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質量不合規格等等，他就得挨罰。事實上罰款往往超過工人實際造成的損失。爲了設法使工人容易挨罰，工廠的鐘點撥快了，發給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製出好的成品。工頭要是沒有足夠的花招來增加犯規數字，便被辭退。

先生們，你們看，這種私人立法的建立是爲了制造過失，而制造過失卻成爲生財之道。因此，廠主不擇手段，竭力減低名義工資，甚至還要從這些並非由于工人的過失而造成事故中得到好處。

這些廠主正是力圖使工人相信只要爲了改善工人的處境，他們是能夠不惜任何破費的慈善家。

這樣一來，廠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廠規用最卑劣的手法克扣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犧牲借反谷物法同盟來提高工資。

他們不惜耗費巨大的開銷來建築宮殿，反谷物法同盟在這些宮殿裡也設立了自己的某種類似官邸的東西，他們派遣整批傳道大軍到英國各地宣傳自由貿易的宗教。他們刊印成千上萬的小冊子四處贈送，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惜花費巨額資金拉攏報刊。爲了領導自由貿易運動，他們組織龐大的管理機構，而且在公眾集會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辯之才。在一次這樣的群眾大會上，一個工人大聲喊道：

“要是地主出賣我們的骸骨，那麼，你們這些廠主就會首先買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國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工業資本家之間鬥爭的意義的。他們很了解，人們希望降低面包價格就是爲了降低工資，同時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工業利潤也就上升多少。

英國自由貿易派的傳道者，本世紀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李嘉圖的觀點在這一點上是和工人們的意見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名著中說：

“要是我們不在自己的本土耕作而找尋新的市場以便獲得更廉價的谷物的話，那麼，工資就要降低，利潤就會增加。農產品的跌價不僅降低了農業工人的工資，而且也降低了所有產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工資。”

先生們，請不要以爲工人在谷物價格較賤時至多收入 4 法郎，而過去卻收入 5 法郎這件事對他們來說是完全無所謂的。

工人的工資和利潤比較起來難道不是越來越低嗎？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難道這還不清楚嗎？不但如此，工人實際上還遭受更大的損失。

當谷物的價格和工資都同樣處於較高的水平時，工人節省少許面包就足以滿足其他需要。但是一旦面包變得非常便宜，從而工資大大下降，工人便幾乎根本不能靠節約糧食來購買其他的東西了。

英國工人已經向自由貿易派表明，他們並沒有被自由貿易派的幻想和謊言所欺騙；儘管他們同自由貿易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但是那只是爲了消滅最後的封建殘余並僅僅同一個敵人進行鬥爭。工人並沒有估計錯：爲了向廠主進行報復，地主和工人聯合行動使十小時工作法案獲得通過；工人們 30 年來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廢除谷物法後，就立即實現了。

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令博士從口袋裡取出一份長長的統計表，他想論證，爲了滿足(照他的說法)工人的消費，英國輸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雞雛等等。可是遺憾的是，他卻忘記了告訴你們，就在這個時候，由于危機來臨，曼徹斯特和其他一些工業城市的工人卻被拋到了街頭。

在政治經濟學中，原則上決不能僅僅根據一年的統計材料就得出一般規律。常常需要引証六七年來的平均數字，也就是說，需要引証在現代工業經過各個階段(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這一段時期內的一些平均數字。

顯而易見，當一切商品跌價時(這種跌價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我用一個法郎買的東西要比過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別的法郎一樣，具有同等價值。因此，自由貿易對工人會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這裡只產生了一個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說，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換別的商品以前，必須先以自己的勞動去交換資本。要是當他進行這種交換的時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勞動換得上述數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價的話，那麼他的這種交易中始終都會是有利的。困難並不在于證明當一切商品跌價的時候，用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多的商品。

經濟學家總是在勞動與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時候去觀察勞動價格。可是他們卻把勞動與資本相交換這一環節完全置之度外。

當開動生產商品的機器需要較少的費用時，則保養被稱為勞動者的這種機器所必需的東西，同樣也得跌價。如果一切商品都便宜了，那麼，同是商品的這種勞動的價格也同樣降低了。而且，正如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勞動這種商品的價格的下跌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時候，仍然繼續相信那些經濟學家的論據的勞動者將發現自己口袋裡的法郎已經融化，剩下的已不到 5 蘇了。

于是經濟學家們會對你們說：好吧，我們同意說工人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在自由貿易的統治下恐怕也不會減少)很快會使工資和低廉的商品價格互相一致起來。但是，另一方面，低廉的商品價格會導致消費的增加；大量的消費需求要求大量的生產，而大量的生產又引起了對人手需求的增加；對人手需求增加的結果將是工資的提高。

全部論據可以歸結如下：自由貿易擴大了生產力。如果工業發展，如果財富、生產能力，總而言之，生產資本增加了對勞動的需求，那麼，勞動價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資也就提高了。資本的擴大是對工人最有利不過的事。這一點必須同意。要是資本停滯不動，工業卻不會停止不動而是會垮台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工業垮台的第一個犧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將先于資本家而死亡。而在資本擴大時，就像上面所說的，在對工人最有利的情況下，工人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他還是一樣會死亡。生產資本的擴大也就意味著資本的積累和積聚。資本集中的結果是分工的擴大和機器的更廣泛的使用。分工的擴大使勞動的專門技能，勞動者的專門技能化為烏有，從前需要用這種專門技能的地方，現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好，從而工人之間的競爭也就加劇了。

這種競爭之所以更趨激烈，是因為分工使一個工人可以完成三個人的工作。機器的採用在更大規模上產生了同樣的結果。生產資本的擴大迫使工業資本家採用不斷擴大的生產資料進行工作，從而使一些小企業主破產，把他們拋入無產階級隊伍。其次，因為利息率隨著資本的積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過活，只好到工業中去工作，從而擴大無產者的人數。

最後，生產資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為市場(這種市場的需求它並不了解)而生產，生產就越是超過消費，供給就越是力圖強制需求，結果危機的發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頻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機又加速了資本的集中，擴大了無產階級的隊伍。

這樣，隨著生產資本的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更劇烈了。大家的勞動報酬都減少了，而一些人的勞動負擔也增加了。

1829 年在曼徹斯特 36 個工廠中有 1088 個紡紗工人。到 1841 年紡紗工人總共才只有 448 人，可是他們所照管的紗錠卻比 1829 年的 1088 個工人所照管的還要多 53353 個。假定採用手工勞動的數量隨著生產能力的發展而相應增長的話，則工人的數量應達 1848 人；也就是說，機械的改進使 1100 個工人失去了工作。

經濟學家們的答復，我們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一定會說，失去工作的人會找到別的職業。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令博士沒有忘卻引用這個論據，同時也沒有忘卻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 年包令博士在下院就 5 萬倫敦織布工人為題發表了演說，這些工人長期以來徒勞無益地尋求自由貿易派向他們許諾的虛無縹緲的新職業而處於饑餓潦倒之中。

讓我們從包令博士的演說中引用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吧。

他說：“手工織工所處的貧困是所有從事這類勞動的人的必然遭遇，因為這種勞動易于學習，而且隨時都可能被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減少，就會引起危機。手工織工好象處于人生的邊緣。再走一步，他們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點輕微的振盪，就足以置他們于死命。機械的進步使手工勞動越來越被排擠，因此在過渡時期必然要引起許多暫時的苦難。民族的福祉只有以某些個人的不幸作代價

才能取得。工業的發展總是靠犧牲落後者來完成的;在所有的發明中間，只有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對手工織工的命運影響最大。在許多手工制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已經被排擠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做的許多其他制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也將被擊敗。”

他接下去說：“我這裡有印度總督跟東印度公司的往來信件，其中論及達卡地區的織布工人。總督在他的信件中說：幾年以前，東印度公司購入 600 萬到 800 萬匹當地手織成的棉布。後來需求逐漸下降，大約縮減到 100 萬匹。

現在需求幾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 年北美從印度得到的棉布約為 80 萬匹。1830 年印度輸出的還不到 4000 匹。而 1800 年裝船運送到葡萄牙的棉布，還有 100 萬匹。到 1830 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過 2 萬匹。

關於印度織工苦難的報告是可怕的。但是這些苦難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國產品在市場的出現，在于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來進行生產。大量的織工死于饑餓，其余的人則轉入其他行業，特別是轉入農業勞動。不能改行的人則活該餓死。現在英國的棉布和棉紗充斥達卡地區。以美觀和耐久著稱于世的達卡細棉布，也由于英國機器的競爭而完全絕跡了。象東印度的整個階級所受的那種苦難，恐怕在全部貿易上都很難找到第二個例子。”

包令博士在演說中所引用的事實是真實的，所以他的演說就更為出色。但是他力圖掩蓋這些事實時所使用的措詞，和自由貿易派的一切說教一樣，是偽善的。他把工人描寫成應該以更廉價的生產資料來代替的生產資料。他故弄玄虛，把他所說到的這種勞動看作完全特殊的勞動部門，而把排斥手工織工的機器也看作特殊的機器。他忘記了，任何一種手工勞動總有一天要經受手工織布勞動的命運。

“實際上任何機器設備的改進，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圖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勞動，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勞動代替成年男工的勞動，用非熟練工人的勞動代替熟練的手工業工人的勞動，以求降低勞動的價格。在大多數機器紡紗廠中，紡紗的盡是些 16 歲及 16 歲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動紡紗機代替了簡單的騾機，大部分紡紗工被解雇，留下的僅是些少年兒童。”

自由貿易的最狂熱的信徒尤爾博士的這些話，是對包令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補充。包令先生談到某些個人的不幸，同時又告訴我們，這些個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整個階級于死命；他談到了過渡時期的暫時的苦難，而且毫不諱言，這些暫時的苦難，對大多數人說來，是從生存到死亡的轉變，而對其他的人說來，是從他們過去的處境到更壞的處境的轉變。如果他進一步說，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業的進步不可分割地聯系著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那麼，他也就等于承認勞動階級打苦難就是資產階級福祉的必要條件。

包令先生慷慨地給予奄奄待斃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貿易派所創立的全部補償理論總的來說可歸結如下：

成千上萬的奄奄待斃的工人們，你們不應灰心失望。你們可以非常平靜地死去。你們的階級不會絕種的。它將永遠保有足夠數量的人聽任資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絕。如果資本不力求保存工人這種可供其不斷地剝削的材料，資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運用呢？

那麼，為什麼還要把關於實現自由貿易對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作為未解決的問題來談呢？從魁奈到李嘉圖的經濟學家們所表述的一切規律是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礙自由貿易的羈絆已不再存在。這些規律的作用隨著自由貿易的實現而加強。其中第一條規律是說，競爭把每一種商品的價格都降低到該商品的最低生產費用。因此，最低工資是勞動的自然價格。什麼是最低工資呢？這就是說，要維持工人使他能勉強養活自己並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後代，就需要一些物品，最低工資恰好就是為生產這些必需品所必要的支出。

不要因此而認為工人只能得到這種最低工資，也不要認為他所得到的總是這種最低工資。

不是的，在這一規律的作用下，工人階級有時也有較幸運的時候。有時他的所得也會多于這種最低工資，但這種多余部分不過是補充了他在工業停滯時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資的不足部分而已。這就是說，工業經過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諸階段而形成一種反復循環的周期，在這一定的周期內，如果把工人階級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計起來，那麼它所得的總額恰好是這個最低額；換言之，工人階級只有經歷一切苦難和貧困，在工業戰場上拋下許多屍體，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保存下來。但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階級還是繼續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數量還在增長。

事情還不止此。隨著工業的發展，出現了更廉價的生活資料。于是，燒酒代替了啤酒，棉織品代替了毛織品和

亞麻織品，馬鈴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斷地找到以更廉價更低劣的食品來維持勞動的新方法，最低工資也就不斷降低。如果說，起初這種工資迫使人爲了活下去而去勞動，那麼，到最後就把人變成機器人了。工人的存在的全部價值只不過在於他是一種生產力而已；資本家就是這樣來對待工人的。

隨著經濟學家們的前提，即自由貿易的實現和成爲現實，勞動商品的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顯現出來。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貿易作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或者就同意說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工人一定要經受經濟規律的嚴厲打擊。

讓我們來作個總結：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換的條件如何有利，只要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係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那些自由貿易的信徒認爲，只要更有效地運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業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對抗，他們這種妄想，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這只能使這兩個階級的對立更爲顯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關，不再有城市進口稅，一句話，假使工人迄今仍然抱怨的造成自己貧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況都全部消失，那時，一向掩蓋著他的真正敵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開了。

他將看到擺脫羈絆的資本對他的奴役並不亞于受關稅束縛的資本對他的奴役。

先生們，不要受自由這個抽象字眼的蒙蔽！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個人在對待另一個人的關係上的自由。這是資本家壓榨勞動者的自由。

當這種自由不過是自由競爭基礎上的必然產物時，怎麼還能把自由競爭奉爲自由的觀念呢？

我們已經指出，在同一個國家裡，自由貿易在不同階級之間會產生怎樣的一種友愛。即使自由貿易在世界各國之間建立起友愛關係，這種友愛關係也未必更具有友愛的特色。把世界範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在任何個別國家內的自由競爭所引起的一切破壞現象，都會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來。我們不需要更多地停留在自由貿易的信徒對這個問題所散布的詭辯上，這些詭辯同我們的三位獲獎者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論證完全一樣。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這種分工將規定與每個國家優越的自然條件相適宜的生產。

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爲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賦吧。

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係的自然界在那裡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五十年，那裡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爲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秉賦作競爭。而這個自然秉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一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

同時不應忽視另一種情況：正如一切都已成爲壟斷的，在現時，也有一些工業部門支配所有其他部門，並且保證那些主要從事於這些行業的民族統治世界市場。例如，在國際交換中，棉花本身在貿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義。自由貿易的信徒從每一個工業部門找出幾個特殊品種的生產，把它們跟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中一般消費品的最廉價的生產等量齊觀，這真是太可笑了。

如果說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那麼我們對此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爲這些先生們同樣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個階級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們，不要以爲我們之所以批判自由貿易是打算維護保護關稅制度。

一個人宣稱自己是立憲制的敵人，並不見得自己就是舊制度的擁護者。

但是，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爲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於世界市場，然而，一旦

它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稅制度也促進了國內自由競爭的發展。因此，我們看到，在資產階級開始以一個階級自居的那些國家裡(例如在德國)，資產階級便竭力爭取保護關稅。保護關稅成了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但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著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讚成自由貿易。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 215-229 頁 輸入)

論反對資本全球化

Hauman

以下三編文章，是筆者去年看信報有感而發，一直放在本人的個人網站內，現公諸同好，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反全球化 I (05/02/2002)

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剛結速，出乎意料地，今年的反全球化示威浪潮比往年細得多，今早看信報沈鑿治的一篇文章，作者對全球化示威完全不明白，一不明白他們是那些組織那些人（一向報導他們的組成非常複雜）；二不明他們的訴求，全球化有甚麼不好；三不明他們的推動力，為何如此拼命；四不明他們的經濟來源，為何每次示威都人丁如此旺盛。上述疑問可說也是大部分香港人的疑問。

記得去年亞太經合組織時，生果日報的社論（10/29）曾說因為中國及印度近年教育普及，所以在全球化中獲益，論者顯然對甚麼是全球化，及反全球化人士的訴求毫無認識，亂說一通。

由於反全球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筆者嘗試以解答沈鑿治的方式，希望有系統地簡單闡釋這個課題。

那些組織的由來，可說是自七十年代越戰後，不少西方理想青年開始質疑資本主義制度，但又不滿足於社會主義，所以出現了一批批的新思潮著作，當年最出名的，有 Fritjof Capra 的 *The Turning Point*，作者在書內認為我們整個文明根本走錯了方向，另外還有 Rachel Carson 的 *Silent Spring*，則有力地說明了這個文明因為走錯了方向，瘋狂地破壞大自然，當年不少青年就是受到了這思潮的感動，開始成立小組，這些小組包括反核組織，綠色組織，勞工組織組（這些勞工組織有別於傳統單求權益的勞工組織，他們結合了環境保護，地方文明的保護等理論），婦女組織（這些婦女組織也和六十年代婦解運動不同，他們非常專注第三世界婦女的權益），另類的教育組織等等，這些組織有他們共同的理念，就是不盲目接受資本主義後工業社會，要求全球每個角落的人都可以有尊嚴不被剝削的生活，以及環境得到保護。

這些組織經多年的努力，有些現已成為著名的大組織，如綠色和平，與及在第三世界國家非常著名的婦女自僱協會，所以嚴格來說，反全球化人士來自不同組織，各有訴求，但他們宏觀的共同理念很接近，卻沒有一個清晰而單一的口號如反核般令人容易明白，所以公眾往往不明白他們的要求。

為甚麼他們要反全球化，筆者希望在另文論述，現在嘗試解答其餘的問題。這些民間組織其實早於八十年代已有極強的組織網絡，他們雖然有不同的訴求，但互通的能力很強，即使在香港，也有一些藝術團體多年前已開始邀請爭取勞工權益的民眾街頭劇人士來港表演，而接待一方，則是由朋友幫忙，筆者也曾義務接待過來自巴基斯坦的朋友。

自從互聯網開始盛行，反全球化人士組織可說一日千里，所以大規模示威也只能在這幾年開始，互聯網的力量，不單止在組織方面，還在思想交流方面進一步強化他們的力量，令他們的理論更完整。

反全球化人士並沒強大經濟支援，可以說這些反全球化人士大部分絕不是經濟充裕的人，所以當同類會議在歐洲或美國舉行時，由於當地反全球化人士力量強大，才能引發大型示威。但當會議在亞洲舉行時，由於機票價錢貴，亞洲各國現時還未能形成強大反全球化力量，所以就難以形成大規模示威。

反全球化 II

相信不少人，包括沈鑿治，都會認為全球化促進資金流通，促進文化交流，減少貧窮，反全球化者只是對全球化誤解而已。這類主流意見，其實只代表了第一世界本位主義者的無知。

自由經濟主義者如阿當史密斯的信徒，會毫無條件地信奉市場供求律，他們認為市場有能力調節一切，但他們卻不知道，阿當史密斯年代根本沒有人會想到全球有限資源的局限。

所謂全球化，說穿了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後工業社會結構，向未被資本主義化及工業化的社群進行輸出同化。現時資本主義後工業社會所能帶動的體系，約共佔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這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大部分來自第一世界國家，其餘百分之八十未被帶動或只部分被帶動的人口，包括大部分國家的原住民，以及人口大國如中國和印度的農民。資本主義社會講求的是低成本、高效率，以現時資本主義社會的尺來量度那百分之八十未被帶動的人口，他們正正是高

人力成本，效率偏低的一群。看看中國大陸，現時有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但在 2000 年，他們的生產總值只佔全國 16%，以資本主義方式量度，這是不可原諒的浪費！

看看美國的例子，一八七零年的美國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農民，經過資本主義的洗滌，到現在美國農業可說是高效益、低成本的典範，但農民比率卻只有百分之三。很明顯地，全球化將會令原住民與人口大國的農民提高生產效率，令農業大量併購，那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將會高速而大量投入工業社會，但我們的地球資源真的能支持這種變化？我們的糧食分配真的能支持這種變化？我們的極限點在那？？全球化可以肯定的能提升那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口袋內鈔票，但真能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另一方面，阿當史密斯的信徒一向信奉供求作原則，但他們不知道，地球的資源並不能以簡單的供求來計算。若以傳統經濟學來看，伐林工業或其他工業會將林木及耕地用途改變，但當林地或農地減少到某一程度，林木及農產品的供應大減而形成價格大升，工業家或商業家們自然會將工地變回農地或林地，但現實是否如此？殘酷地答案是否定的。林地與農地被改變用途後，表土會很快流失，土地會沙化，以現時的科技，沙化的土地要重種表土，花費的人力物力資源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承受。我們的地球，可以承受這樣的工業化過程嗎？

走筆至此，相信讀者們一定會明白，反全球化人士中，為甚麼大部分是學生、組織義工、某些工會領袖、甚至乎是學者，但卻看不見大規模的工會人士出動了。前美國國務卿奧爾佈賴特最近接受財富雜誌訪問時也指出，反全球化者現已不單是為反而反，部分人開始提出了一些合乎法理的要求，如果世界領袖們再無視反全球化者的存在，只會令問題更激化。奧卿又指出，在十多年前，各國領袖會議是不會邀請各大企業參與的，但近年來各國深明企業對全球政經的深遠影響，不少會議都會邀請他們加入，現在各國領袖是否應該開始學習開放胸襟，在國際會議上邀請反全球化組織參與？他們是否能開放心靈聆聽異見？

只有將反全球化人士納入正常機制，他們現時薄弱的理論基礎才會得到較學術性的研究，反全球化運動才不會被過分浪漫化而給別有用心者所利用。

反全球化 III

記得去年董建華參加亞太經合會議時，有一位外國女記者問我們的特首對 Barter 制度的意見，當時特首聽到一頭霧水，筆者看到那篇報導後，真為我們的特首感到無地自容。

Barter 制度是反全球化人士近年的主要研究課題之一，表面看來，Barter 制度是以物易物，甚麼是以物易物？其實反全球化人士所提倡的，不是單純的以物易物制度，他們所研究的課題，是如何通過以物易物來達致更公平更和諧的社會。

以物易物明顯是挑戰已有數千年歷史的金錢制度，人類之所以發明金錢制度，是希望通過統一公認的貨幣單位，為貨物訂定公平價格。全球化能否為我們帶來更公平的貨品價格？表面上，全球化可以令貨品流通量加快，令價格更公平，但想深一層，全球化卻令某些產品在某些時候出現扭曲價格，進而產生嚴重的後遺証。以農產品為例，幾千年來，糧食是人類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務農為人類提供糧食來源，糧食的價值在全球大部分地方都佔人類收入的極大比重。後工業化與綠食革命後，糧食在美洲的生產成本大幅下降，日本農民數千年來穩定的生活就因為美洲糧食的輸入而起變化，農民為掙鈔票，成為社會上最窮困的一群。

近年日本農民因生活困苦大量流失（由於地理關係，日本農業不可能如美洲般工業化），在供求定律中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但深入一點去考慮，日本會因而流失農田，表土亦會因休耕而沙化，農田流失不容易復耕，長遠來說，糧食供應便會取決於別國人手上。若基於這一點，全球化不單令農民失去生計，還令國家陷入長線危機，以及令環境受破壞。

以物易物的精髓是本地化，反全球化者提倡各地區建立細小社群，互相交換物資與技能，這些社群不必完全取消鈔票，但他們卻有可能因為互相交換，而有八成生活所需得到保障，若他們只需為兩成的鈔票煩惱，生活必然會更容易更舒適。以物易物反映的是社區價值，而不是國際貨品價值，天然資源會得到進一步的保障。若果以物易物在巴西實行，我們的熱帶雨林就不會因麥當奴買下養牛而受到破壞，當地土著也不會因而饑荒。或許有人說麥當奴買下土地，只反映市場價格，可昔熱帶雨林是供應全球所有生物氧氣最重要的地方，但我們卻無權反對麥當奴破壞雨林。可以說，以物易物某程度上更能反映天然資源的真正價值，不會因全球化而受財團破壞。以物易物亦更能保障失業，只要你懂得任何人缺乏的技能，你便有生存空間，你可以為別人理髮，也可以為別人捉老鼠，也可以用數種技能生存。生活更平等，貧富不會出現懸殊情況。

這種以物易物聽來好像烏托邦，或許已被反全球化人士過分浪漫化，不過據筆者所知，這世上事實已有些地方建立了

類似社群，但筆者認為，這種改變不單是經濟學的問題，而是哲學的問題，究竟怎樣才算是幸福生活？這才是我們首先需要探討的課題。

孔誥烽：世貿示威者的知音

作者為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以推廣自由貿易為己任的世界貿易組織，近年部長級會議頻頻出現富國與窮國談判破裂的困局。發達國家嘗試迫使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後者指摘前者不斷補貼出口農產品乃屬雙重標準，因此拒絕妥協。不少論者認為，世貿談判屢次破裂，顯示奉自由市場為神明、主張在國際實行自由貿易、在國內減少政府干預市場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思潮，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發達國家的權宜之計

新自由主義思潮自 80 年代崛起於英美後，即被捧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被推銷到發展中國家去。但若我們仔細回顧一下新自由主義崛起的過程，便不難發現它其實只是發達國家為回應七八十年代持久經濟危機而採納的一套權宜之計和意識形態（有關歷史可參考 Yergin 與 Stanislaw 的《The Commanding Heights》）。

在不足半個世紀之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曾將 30 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衰退和間接由此引起的二次大戰，歸咎於 20 世紀初世界市場的無約束運作。美國在羅斯福新政後建立社會保障和立法規範市場運作的成功經驗，使凱恩斯有關政府干預能糾正市場缺陷的理論取代古典自由主義而成為經濟學的新典範。在國際層面，維持主要貨幣間的固定匯率、限制資本國際流動、各國以關稅調節外貿、富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援助等政策，則被視為防止世界經濟像戰前般崩潰的關鍵。

通過政府介入推動經濟增長的公式，更在美國的推銷下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快速工業化的希望所在。在穩定的國際經濟環境與充裕的發展援助下，巴西與印度等國的工業均在戰後茁壯成長。

但到了 60 年代，曠日持久的越戰加上日本和德國的競爭，令美國政府的財赤大幅增長，經濟一沉不起。美元強勢不再，迫使尼克遜在 70 年代初放棄金本位政策，不理會通脹後果而企圖通過大量印鈔去解決財赤。同時美國亦減少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在國際利率低落和發展援助減少的情況下，第三世界政府紛紛向國際私人銀行大舉借款，以維持高公共開支，高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

70 年代末，美鈔的過量供應和美國在第三世界的連串軍事及政治挫敗，令美元的公信力瀕臨破產。美國政府最終決心以大舉減少政府開支和貨幣供應等激烈手法來挽救美元。大減政府開支乃列根推行激進市場化改革的起源，減少美元供應的後果則是全球性的利率暴漲。這令發展中國家在 70 年代欠下的溫和債務立時變成難以償還的巨債，造成了今天仍未解決的債務危機。

若第三世界政府紛紛撤債，必然導致全球金融體系大崩潰。為避免這一危機爆發，美國即通過國基會、世銀與關貿（世貿前身）等組織，威迫利誘第三世界政府採取一系列包括將公營企業私有化、削減社福開支、全面開放國內資本市場和進行自由貿易的市場化改革，希望藉此增加這些國家的財政盈餘和外匯儲備，從而加強它們的還款能力。以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為代表，崇尚自由市場的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便是在這一時代脈絡下取代凱恩斯學派而代成為經濟學的主流。

發展中國家的災難

但新自由主義政策很快便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各種災難性後果。全面開放國內市場令這些國家面對急速進出的熱錢和與日俱增的金融危機風險。私有化與反福利的社會政策，則導致嚴重失業與貧窮問題。墨西哥、阿根廷、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以及在八九十年代蔓延拉美的搶糧暴動、罷工、中產階級與公務員上街等抗爭事件，其實都可歸因於急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近年主張限制自由貿易、重建財富再分配體制的左翼力量紛紛在委內瑞拉、巴西、烏拉圭、智利等國的選舉中獲勝，並非偶然。

就連著名國際炒家索羅斯（George Soros）看到新自由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破壞後，亦在其《Open Society :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一書中指出，雖然在任何自由市場裏，都必會有「贏家」和「輸家」，但在現今贏者全贏的全球自由經濟中，「輸家」得不到任何生存保障，翻身無望，最後可能會在絕望驅使下以極端行動將遊戲破壞，與贏家同歸

於盡（這可說是對九一一襲擊的準確預測）。他因此呼籲各國領袖及時行動，令全球經濟一體化能在更公平和更有秩序的前提下進行。他甚至指摘新自由主義者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者」(market fundamentalists)，與恐怖分子相去不遠。

範式轉移醞釀之中

在主流經濟學界，一場類似 80 年代由凱恩斯主義向新自由主義過渡的範式轉移，其實已在醞釀之中。例如在 02 年巴西工人黨在大選中行情看漲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克魯明 (Paul Krugman) 即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指出，巴西在實行了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後，經濟實力毫無改善，但國內的貧富差距卻增長了好幾倍。巴西人民支持左翼政黨，積極求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幾位曾對新自由主義大膽批判的經濟學家(如 Amartya Sen 與 Joseph Stiglitz)，更在近年相繼獲得諾貝爾獎。

看來，在每次世貿會議場外高喊口號的反全球化示威者，在體制內並非沒有知音。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年底的世貿香港會議，會否再次以談判破裂收場。除了示威者與警察會否發生衝突外，世貿來港開會，還帶來很多其他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

延伸閱讀：

1.Yergin,Daniel and Joseph Stanislaw.1998.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Simon & Schuster

2.Soros, George. 2000. Open Society: 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